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 James W. Carey 撰 李 昕 译

[摘要] 文章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闻教育为线索，探讨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新闻学教育、职业伦理教育过多地倾向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新闻教育中缺乏新闻实践技能。文章批判了传播学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能深入研究其内涵，并指出了新闻学教育应该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谴责的意味，我得为自己的冒犯解释一下。请注意，我的重点是新闻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这个话题而言，像那个快乐的圣歌作曲圣弗朗西斯说的一样：我对于美德的惟一理解来源于对恶行长期的亲密接触。所以如果这篇文章看起来有些回忆的味道，像是我对自己所犯过错误的总结和回顾，那就是我在这个有限时间里能达到的最好程度了。

和所有初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人一样，我任教遇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一位名叫马文·戈尔夫德的本地历史学家不同寻常的演讲。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带着我们走遍曼哈顿岛，参观了周围邻近的地方，简要介绍了居民情况，并历数这个城市里不同的居住人群最细微的差别。他把我们领到东部，布鲁克林区、哈林区和哈德森河，给我们讲述曼哈顿邻近的地区怎样影响新泽西和其他地区。他十分细

致地描述了各个居住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交通和交流情况。他还详细讲述了1898年发生的大事，那年曼哈顿打破地域界限，与附近地区合并为一个大都市，本来是美国第五大城市的布鲁克林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戈尔夫德先生和我们的旅程不仅是一次浪漫的感悟，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很实际的练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他尝试着让学生理解这座城市，这样当他们以后投身于其中的时候才能适应并生存下来。这种关于环境的介绍尽管有很多艺术的成份在里面，同时也是一种实用技能的训练。学生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总要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城市的故事，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错综复杂的路线中找到方向，不能因为找不着路丢了性命或者缺胳膊少腿。

哥大新闻学院的起源我不愿赘述，像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与约瑟夫·普利策的来往，

1908年哥大收到建立学院的资助,1912年新闻学院设立本科并开始招生,在普利策的坚持下,新闻和广告学院分开,由此取得了诸如《世界报》等校内报刊的成功,其后新闻学院从哥伦比亚学院分离并成立自己的研究生院,结构与1935年无异。秉承哥大传统,新闻学院除了课程有名,还与其他机构合作,并组织了很多人活动,如普利策奖评选、杜彭奖评选、《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等。尽管我们无需对镌刻在建筑物上的普利策建院时的高尚目的进行怀疑,但是普利策也可能有不那么崇高的动机。和绝大多数人类的成功事业一样,它的诞生也或多或少有些罪过之处。

学院建立初期,美国记者不是社会的高层。印刷行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执掌,编辑室里主导的也是荷瓦斯·格雷利、詹姆斯·哥登·博纳特等等,新闻记者就是从这些地方被赶出来的。普利策自己也不那么成功。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一个记者的时代。记者成为新闻的来源,“不断发生的事情”迫使他们成为新闻的中心领域,报纸成为搜集撰写新闻的工具,而不再充斥着编者按、公务文档的东西。但是记者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他们多半是三流作家,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但是更多的是想进入上层社会的移民的后代,虽然没受过教育也没有多少文采可言,但具备与生俱来的语言天分。

他们的政治观点多半很极端,撰写的文章也常常出人意料。实际上,他们的表现成为这个行业的传说。社会的底层是他们的来源也是描写对象。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工会,这和他们老板的目的相去甚远。包括普利策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大学教育可以教化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教给他们原则,使之远离社会主义和工会。教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当成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持不同意见的团体,并使他们与工作单位目标一致。职业教育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知识或者职业素养,成为这种教育的主要内容。目的就是为得到一群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

职业习惯并且政治倾向保守的从业人员。

虽然这个目的不能用来解释新闻学院在哥大的设立,但是在这个从人文学院、传统的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招来大批教授的地方,新闻实践技能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最初教授新闻的老师多半是从英语专业出身,自己探索着将新闻与历史、伦理和法律结合。他们实际上是想在人文的基础上建立这个新兴的学科。如果新闻是一种职业,它就应当有自己的历史。新闻教授的职责就是写出新闻的历史,以此证明为什么大学应该开设新闻学院。同样的,如果新闻是一种职业,它就应当有自己的职业伦理,至少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价值。新闻教育者试图制造出这种伦理系统,并通过第一修正案的解释确立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新闻教育者不仅教书,还要致力于勾勒这一职业的轮廓,提升新闻的地位使之名正言顺地在大学里拥有一席之地。

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本来就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目的。从英语文学中分支出来后,新闻学被迫在学术环境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所以自然而然地在伦理、历史和法律等学科中寻找传授这么一项世俗化技能的理由。人文学科和法律很难容忍这样一门低等学科与有着悠久职业历史和职业荣耀的自己相提并论。但是在1940年底,伴随着战争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使新闻教育在大学里的地位得到巩固。这个有趣的故事说来话长,我仅仅在这里讲个大概。

二战期间出现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信号系统的数学基础的发现,特别是在雷达和声纳上的应用。这成为战争的焦点,政府资助实验室进行大量与此有关的技术研究。该发现用处很广,从电报的操作到自动门的应用到灵长类动物的高级活动,这项数学研究提供了一条用以解释所有的机械、电子和人类系统中内部关系的途径。科学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掌握统一各种独立现象自然过程的方法。在1940年后期,科学家发现寥寥几条能用数学完全解释清楚的法则就主宰了传播的全过程,至少是信号通过电线、大气和神经传递的过

程。这个发现所带来的兴奋和骄傲今天已经难以衡量。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就怀有的一些关于理性的梦想,这正是其中一个。这个梦想实现改变了高等教育,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这与政府资助的关于敌方宣传、军队士气、国内战线的瓦解等研究紧密相连,但是学术研究达到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

这样,新兴的传播学诞生了。这是一门关于物理、生物和社会所有系统间控制和协同的科学。国家安全状态重新确立的年代,传播学取代大学中战后出现的研究真空,影响了大学的机构、课程设置和学术前景。

可以肯定的是,传播学的发展是本世纪非凡的成就之一,它使得一群知识分子从事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但是这种发展并不一定有益于新闻学,因为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3条原则对传播系的学生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我将简要讲述这3条原则。

原则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原则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媒体是指组织、政府机关、专业技术等等,新闻在其中产生。传播是对信息中转方式的一种概括。媒体、传播与新闻截然不同。无论组织大小,参与者是个人还是团队,用声音、文字、印刷还是电视镜头的方式都能实践新闻报道的过程。新闻在哪里产生,以何种方式产生是很重要的,但不能据此将新闻本身与媒体和传播混为一谈,否则就是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原则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对新闻的实践不是一种自我确立的过程,事实上他们在自己造成的社会影响中得到确立,那就是民主社会秩序之下的宪法。在前苏联也有媒体和传播,甚至

有类似新闻机构的单位。但是没有新闻,原因是缺乏使之产生的惟一条件——民主。现代的专制社会就像哲学家查理斯·泰勒所称,有貌似新闻的举动:社论是作者想提供给市民们思考的观点,报纸和电视上的故事为了真实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规模示威是为了给广大民众泄愤渠道。所有这些好像都是真正的通过交流达成共识的过程。但是一切从一开始就受到精心控制。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这么像新闻但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学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产物?因为机构的民主是新闻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奋斗目标所在。

符合这3条原则的新闻学不是公共关系或者任何其他学科。依赖民主的新闻学不是媒体,也不是传播。但二战以后传播学的发展使新闻学的存在受到威胁。传播的发展来源于新闻教育内部的压力,连传播学的创始人都深深明了这对于新闻学构成的威胁。诺波特·维诺在他预言性质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类的利用》中,承认传播学科就是对一切进行控制的学科,存在与否都对一些文化的主要推动力、最具人文价值的因素构成威胁。

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但是现实中他们又常常搭档。这不是一种启蒙的或者公众的学科,来源于社会的科学,用来澄清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解除我们的困扰、提高我们的精确性,相反它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用来统治人民,即使是以亲切的面目出现。与芝加哥建立的传统传播科学,那种符合新闻的最高理想的学科不同,这门新兴的学科使得新闻成为它的分支和目的之一。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这种新的传播科学在哥大没有多大影响力,但是这个好消息并没有根本解决新闻教育面临的困难。

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

和人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

不幸的是,也很自相矛盾的是,人文科学对新闻学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以新闻学为耻。人文科学建立在对高等和流行文化的区分上。新闻看起来却是一种世俗的读物。新闻不仅服务大众,而且使用最平实的语言达到最通俗的目的:引起生活的共鸣。人文科学对新闻学的鄙夷构成了将新闻学和人文学术研究分开的天然鸿沟。

虽然近年来人文科学也对新闻开放,这种改变来源于他们正在经历的解构阶段,就是一种反人文的趋势,将人类的想象降格为意识形态。从自然家园分离出来后的新闻教育在技术和科学中寻找归宿。就长远来看,技术很难使新闻在大学中确立一席之地。科学据其主导的定义来看,大幅度削减了新闻中的民主成分。作为一门科学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关于新闻的科学,关于政府机构、系统、程序、管理和控制的科学;而不是以创作和解释为内容,关

于理解普通行为的科学。来源于外部的科学难以与新闻的内在的冲动契合。这将不可避免地将新闻的丰富多彩蜕变成另一种模式:可以预知的,普通的,平凡的科学。科学贬低了新闻记者为自己树立的形象,也放弃了新闻为建立民主社会所做的努力。

在人文科学中没有找到归宿的新闻转向科学: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科学。如果这种传播科学与芝加哥大学所希望并实践的一样是关于空间和地域的,是来源于本土的独特的,是关于人类在冲突和分离中和建立共同生活的斗争中所蕴涵的复杂关系的,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科学,我们的故事大约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尾,而新闻教育可能会明白无疑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这使我意识到,新闻教育和新闻职业的承诺还远未实现。

(本文系 Carey 教授提交给 20 世纪新闻教育峰会的演讲稿)

(译者:李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生)

Where is the wrongness for journalistic education ?

James W. Carey Translated by LI Xin

Abstract: Taking example of journalistic education at the Journalism School of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article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existed in journalist education; too much has been tilted to politics and ideology; lacking of practical skills. The article criticizes that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reviews news in an utilitarian sight and does not reveal its connotation.

Key words: Journalistic education; where is the wrongness

[责任编辑:王 海]